

# 深切感受吴征镒院士 教诲之情

## 黄观程

(1930~)，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

### (一)

自从我走出校门参加工作不久，就与吴老有密切接触。一年前曾写了回忆吴老的点滴资料，现作些补充，以表达对吴老的缅怀之情。

2007年2月我寄去春节贺卡给吴老，附言写了：“万分感谢您去年秋天惠赠巨著《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和分化》。您的学识财富使后辈永远受益。拜读后使我想起1956年云南大围山之行。前苏联专家伊·阿·林契夫斯基当时在考察路上低声对我说：‘吴教授真了不起，他能用望远镜认出远处林冠的树种’。”



1956年在云南（右起：武素功、吴征镒、黄观程）

两年后，我又收到他挂号寄来的自传性大作《百兼杂感随忆》。2009年1月，我回了一封信，内容如下：去年底收到您的《杂感随忆》巨作，谢谢，拜读后深怀敬意。这是珍贵的我国植物学史料、深入浅出的科普读物、待人处世的活教材、图文并茂的学术活动经历、多才多艺的光辉人生。大师之作，敬佩之至！回忆起数年前您来华南植物所时特意让您的博士生为我俩拍的合照、文采<sup>1</sup>兄带其研究生来所查阅标本并到编辑部看望我时的合影，以及五十三年前蔡老<sup>2</sup>赠给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翻译的一张签名照片，至今皆珍藏完好。光阴荏苒，大师之风范依然。春节将至，祝吴老新春快乐、健康长寿、阖府平安！

我认识吴老，是1956年初在“中苏云南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当随队翻译时开始的。他是中方植物学组的组长，植物学家有蔡希陶、曲仲湘、冯国楣、仲崇信以及王文采、陈灵芝、胡嘉琪、刘亮、朱太平、吴德邻、武素功等。这一年，主要考察东南部的屏边大围山、金平，直到河口。次年，从2月至7月，我们在海南岛及云南南部西双版纳一带考察。以后多年，我常陪同前苏联和东欧有关专家在国内考察并在北京参加一些学术座谈会，与吴老也不时见面。在云南的两年终日生活在一起的日子凝聚了我们的友谊。

1 王文采，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为人非常谦虚，钻研业务精神可嘉，深受吴老的赏识。

2 蔡希陶，研究员，昆明植物园、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创建人，曾任中科院昆明分院副院长、昆明植物研究所副所长等。为人和蔼，性格开朗，在考察队里常对年轻人讲述云南各民族风情趣事和奇闻，是个云南通。



我在2000年底应约为广东省植物学会写的一篇纪念陈焕镛和张肇騫两院士的文章里谈到了吴老及其他的一些植物学老前辈，并将文章寄给了吴老。该文后来重写，分别以题为《和陈焕镛院士在一起的日子》和《危言危行献身科学的一生——记我国著名植物学家张肇騫院士》收录于《华南植物园80周年纪念文集》。值得一提的是，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着手翻译前苏联植物学家塔赫他间院士著的《世界植物区系区划》一书。翻译过程中我多次通过信函向吴老请教有关术语，得到他的热情帮助。译稿承蒙中山大学张宏达教授校订，于198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问世不久即脱销，原来它是许多这方面专业的研究生的重要参考书。

1992年初我惊奇地收到《中国科技翻译》副主编李亚舒的邀请函，特邀我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科院第一次翻译代表大会暨翻译研讨会，并要我在大会上作个发言（分院外事处处长兼广州译协副理事长熊国炎也动员我这个分院译协理事长前去参加）。我在翻译界老前辈和一些名家（如著名英语专家李佩和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王天铎等教授）的主题报告后讲了20多分钟，自感有点惭愧。

原来，李亚舒以笔名李幼秧写了一篇题为《应立志成家——访吴征镒教授》的报道，发表于《中国科技翻译》1990第3卷第1期。其中吴老谈到：“科技翻译工作，涉及的学科名词很多，涉及的学术思想有极严密的逻辑性。……翻译的质量，主要由翻译者本身的素质和水平决定。……一名成功的科技翻译工作者要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提高自己的知识深度；成熟的科技翻译工作者，应下定决心深钻一门自然科学，立志成为某一学科的科学家。最近我收到了王（黄）某某的著作《……》。大家都知道，他原来是搞俄文翻译的。在我国华南植物所和昆明植物所里<sup>3</sup>，都有些人原来是搞俄文翻译的，现在都成了植物学家，实在难能可贵。”上述上海会议使我开阔了眼界，并得以在大学毕业30多年后见到了一起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的林德音（云南考察时任动物组翻译）和蒋桂玲等同学。

2001年我所有位领导告诉我，塔赫他间最近出了新著《Diversity and Classification of Flowering Plants》（1997年英文版），要我翻译成中文出版。我说专业人士直接看原文容易，无须翻译。但他鼓励我要我做，我只好征求吴老的意见，并同时与塔氏<sup>4</sup>及科学出版社联系。吴老和塔氏（当时已91岁高龄）是同行又是老朋友（2001年吴老曾推荐塔氏为COSMOS国际大奖<sup>5</sup>候选人）。没想到85岁的吴老亲笔给我写了满满一整页纸的回信。信中详细交代翻译此书须注意事项、术语的运用、应参考的书目等等，还允诺为我的译本作序或推荐出版，使我很感动。他诲人不倦的一片真心使我永远铭记。由于该巨著长达640页，专业性强，难度大，实非我一个人能胜任，且涉及出版经费及其他原因，此事最后作罢。

## （二）

吴老在野外考察的执着和不畏险阻的精神让人敬佩不已。记得我们颠簸去大勐龙，后又坐上

3 指他培养的李恒教授。

4 2001年底我用英文发E-mail给塔，他于次年1月初回邮件称，该书问世已经五年了，需重新修订，并十分乐见中文版的出版。他还表示可边修改边通过互联网发来部分稿件（单子叶部分），其余将于4~5月交齐，同时声明保留版权以备再出新版的英文版。

5 据说COSMOS国际大奖被誉为植物学界的“诺贝尔奖”，世界上有七位，亚洲仅两位获此殊荣。吴老于1999年获此大奖。



小木舟，由战士和船夫下水前后扶着连拉带推渡过澜沧江一处浅滩急流去橄榄坝，再转向勐腊方向考察的情景。据说当时仍有土匪和国民党残部在边境活动，故派给了考察队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荷枪实弹，还有一挺机枪，骑着马为我们护行。山上是哈尼族的村落，途中要经过沿山修筑的梯田，只能走在弯曲而狭窄的田埂上，而上下梯田间，落差有的达一米多。走在这样的崎岖小径，无不提心吊胆。



1999年华南植物所建所70周年所庆（右起：王献溥、张宏达、吴征镒、莫熙穆、林英、黄观程）

解放军战士为了中苏专家方便，让他们上马骑着走，也给了我一匹高大的战马。可上马后这匹马怎么也不干，不停地蹬起后腿，高高地往下扭摔，企图把我抛下。战士教我死死勒紧缰绳用力往后拉，并用双腿使劲夹住马肚。但多次尝试均告失败，只好下马。真是一上马就马上给我下马威！战士说我太轻了，马不服我。我只好跟在后面由战士牵着马走。

走着走着，我问战士：“这样陡峭的梯田小路会不会不小心落马啊？”“不会，你别看这高大的军马，它们是很细心的，对主人忠心耿耿，很老实，很耐心，像亲人一样。”他悠然地说着。话音刚落，前面吴征镒骑的马突然滑落在左侧的梯田里。吴身上挂着的从不离身的照相机和望远镜全泡在水田里，眼镜也脱落了，而且腰还碰到田埂上。真是马失前蹄啊！随后排长解释说，吴教授骑的这匹公马其实蛮优秀，可能是它惦着后面那匹雌骡；我们已经特意将它排在最后。我察觉它不停地边走边回头看，而且听到战士老在叫唤“走，走！”看来再优秀也有失足之时。但吴教授对植物资源发掘的敬业精神，真是一马当先！

### （三）

吴老学识渊博。1957年初，我们在海南五指山通什和尖峰岭考察后，回程在南部滨海的南山岭考察，由于天色渐晚，但带路人说很快就可以下到海边。此处坡度较大，杂草丛生，无路可循，花了不少时间才到达海边。这里碧海蓝天，似乎没人到过，到处可见美丽的贝壳。不远处有一海岸边防哨所，一战士马上跑过来喊话，不让我们接近碉堡，于是我们远离它，但大家仍被光彩的贝壳所吸引。我在岸边大石块旁发现多条粗大黝黑的海参在缓慢游动，遂下手去捞。吴老当即说了一句“小心”，我还未明白过来，海参瞬间喷出无数又长又软又黏的白丝缠住我的手，把我吓坏了。吴老仍然一心去捡他的贝壳。此时我才知道他是位贝类爱好者。我也捡了不少大小各异、艳丽夺目的贝壳。当苏联专家问起这些物种的名称时，吴老竟然一一说出其学名，还用拉丁文写出来，使大家赞叹不已。一向幽默的费多罗夫说，吴教授不但是植物学家，还是动物学家呢！

返程已伸手不见五指，只好让停在马路边的考察车打开车灯往下照明以引路。回到三亚鹿回头招待所已是晚上9点多，大家又累又饿，可吴老还在欣赏他的贝壳。

吴老在高龄阶段完成他几部总结性的学术论著和传记，而且在92岁时荣获国家主席胡锦涛颁发的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大奖，真了不起。之前，他的一些重要著作都寄赠给我，使我受益良多，可见他对后辈的关怀。20世纪80年代黄向旭去云南采姜科标本，认识了武素功，武带他去见吴老。年逾古稀的吴老说：“啊，观程的孩子那么高了呀！”